

國
無
日
高
飛

建文

皇帝全傳

● 廖心一 著



明史纪实小说系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廖心一 著

建文

皇帝全传

逐燕日高飞

戊戌暮秋
王心一
书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文皇帝全传 / 廖心一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9.1

(明史纪实小说系列)

ISBN 978-7-5155-1739-1

I. ①建… II. ①廖…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7452 号

建文皇帝全传

JIANWEN HUANGDI QUANZHUAN

作 者 廖心一

责任编辑 王媛媛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39 千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739-1

定 价 58.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64210030

编 辑 部 (010) 6439987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18911105819

明帝世系表

名 讳	庙 号	谥 号	陵 寝	年 号	在位公元纪年
朱元璋	太 祖	高皇帝	孝 陵	洪 武	1368—1398
朱允炆（太祖孙）		惠皇帝		建 文	1399—1402
朱 棣（太祖子）	太 宗	文皇帝	长 陵	永 乐	1403—1424
（嘉靖十七年改成祖）					
朱高炽（太宗子）	仁 宗	昭皇帝	献 陵	洪 熙	1425
朱瞻基（仁宗子）	宣 宗	章皇帝	景 陵	宣 德	1426—1435
朱祁镇（宣宗子）	英 宗	睿皇帝	裕 陵	正 统	1436—1449
朱祁钰（宣宗子）	代 宗	景皇帝	景泰陵	景 泰	1450—1456
朱祁镇	英 宗			天 顺	1457—1464
朱见深（英宗子）	宪 宗	纯皇帝	茂 陵	成 化	1465—1487
朱祐樞（宪宗子）	孝 宗	敬皇帝	泰 陵	弘 治	1488—1505
朱厚照（孝宗子）	武 宗	毅皇帝	康 陵	正 德	1506—1521
朱厚熜（宪宗孙）	世 宗	肃皇帝	永 陵	嘉 靖	1522—1566
朱载垕（世宗子）	穆 宗	庄皇帝	昭 陵	隆 庆	1567—1572
朱翊钧（穆宗子）	神 宗	显皇帝	定 陵	万 历	1573—1620
朱常洛（神宗子）	光 宗	贞皇帝	庆 陵	泰 昌	1620
朱由校（光宗子）	熹 宗	哲皇帝	德 陵	天 启	1621—1627
朱由检（光宗子）	思 宗	烈皇帝	思 陵	崇 祯	1628—1644
（后改毅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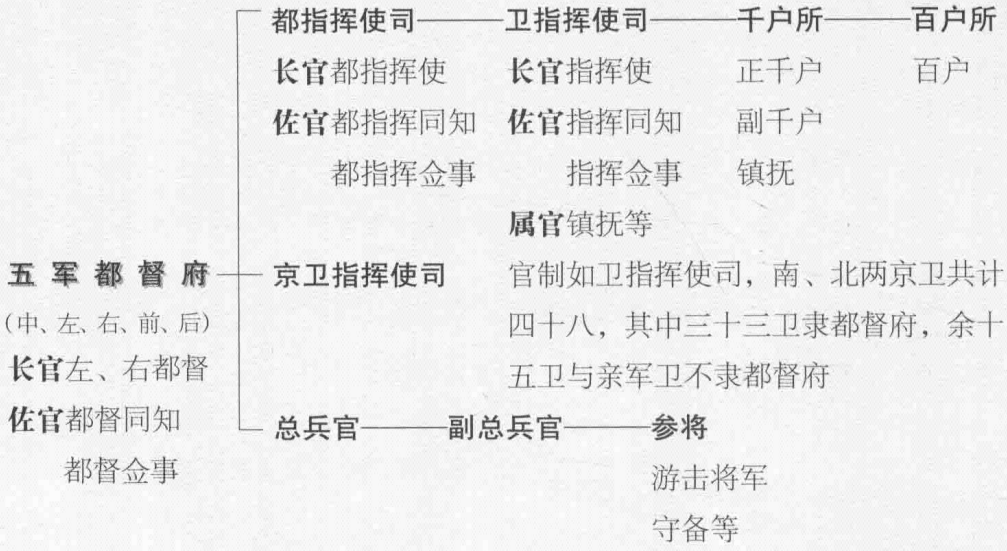
明朝文职简表

衙 门	职 官	职 掌	备 注
内阁	殿阁大学士，预机务，称阁臣或辅臣，初加低品职衔，后均加尚书职衔	票拟圣旨，批答奏章	史称阁臣有相权而无相名
六部（吏户礼兵刑工）	长官尚书，佐官左、右侍郎，属官郎中、员外郎、主事等	分掌庶务	以上衙门长官合称七卿
都察院	长官左、右都御史，佐官左、右副都御史，左、右金都御史；属官十三道监察御史等	纠劾百司，会审大狱重囚	
通政使司	长官通政使，佐官左、右通政，左、右参议等	进内外章疏	
大理寺	长官卿，佐官左、右少卿	审臧平反刑狱	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以上衙门长官称大九卿
太常寺	长官卿，佐官少卿	掌祭祀礼乐等	以下至苑马寺，长官称小九卿
光禄寺	长官卿，佐官少卿	掌祭享宴劳等	
太仆寺	长官卿，佐官少卿	掌牧马政令	
詹事府	长官詹事，佐官少詹事	辅导太子	
翰林院	长官学士，佐官侍读学士、侍讲学士	掌文翰、备顾问	
鸿胪寺	长官卿，佐官左、右少卿	掌朝会等仪礼	
国子监	长官祭酒，佐官司业	掌国学训导	
尚宝司	长官卿，佐官少卿	掌宝玺等	
苑马寺	长官卿，佐官少卿	掌各监苑马政	

续表

衙 门	职 官	职 掌	备 注
六科（吏户礼兵刑工）	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	侍从、规谏，稽察六部	
中书科	中书舍人	掌殿阁书写事	
行人司	司正，左、右司副，行人	掌颁诏、册封等	
督抚	总督、总制、总理、巡抚，加佥都御史至尚书、都御史衔	总督军务，巡抚地方	俗称封疆
顺天府	府尹、府丞等	掌京府政令	
应天府	同上	同上	
承宣布政使司	左、右布政使，左、右参政，左、右参议	掌一省之政	与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
提刑按察使司	按察使、副使、佥事	掌一省刑名	
府衙	知府、同知、通判等	掌一府之政	
州衙	知州、同知、判官等	掌一州之政	
县衙	知县、同丞、主簿等	掌一县之政	

明朝武职简表



亲军卫指挥使司 司宿卫，设官同京卫，其中，锦衣卫又司缉捕、刑狱，下设南、北二镇抚司，北司专治钦定重案，即所谓诏狱。

明朝宦官简表

衙 门	职 官	职 掌	备 注	司 礼 监——司 苑 局 合 称 二 十 四 衙 门
司礼监	提督、掌印、秉笔等太监	掌内外章奏，御前勘合	有内相之喻	
内官监	掌印、总理、管理等太监	掌宫室、陵墓等营造	以上十二监	
御用监	掌印、把总、掌司等太监	掌御用物什		
司设监	掌印、总理、管理等太监	掌仪仗、卤簿等		
御马监	掌印、监督、提督等太监	掌御马房、象房等		
神宫监	掌印、金书、掌司等太监	掌太庙洒扫、香灯等		
尚膳监	掌印、提督、总理等太监	掌御膳、宫内食用等		
尚宝监	掌印、金书、掌司等太监	掌宝玺、敕符、印信等		
印绶监	掌印、金书、掌司等太监	掌铁券、诰敕、勘合等		
直殿监	掌印、金书、掌司等太监	掌各殿、廊庑扫除		
尚衣监	掌印、管理、金书等太监	掌御用冠冕、袍服等		
都知监	掌印、金书、掌司等太监	随驾前导警蹕		
惜薪司	掌印、总理、金书等太监	掌薪碳之事	以上四司	
钟鼓司	掌印、金书、司房等太监	掌出朝钟鼓及诸内戏		
宝钞司	掌印、金书、管理等太监	掌造粗细草纸		
混堂司	掌印、金书、监工等太监	掌沐浴之事		
兵仗局	掌印、提督、管理等太监	掌制造军器、火药		
银作局	掌印、管理、金书等太监	掌打造金银器饰		
浣衣局	掌印、金书、监工等太监	安置老年及罢退宫女		
巾帽局	掌印、管理、金书等太监	掌内用帽靴		

续表

衙 门	职 官	职 掌	备 注	
内织染局	掌印、管理、金书等太监	掌染造御用、内用缎匹	以上八局	
针工局	掌印、管理、金书等太监	掌造宫中衣服		
酒醋面局	掌印、管理、金书等太监	掌造宫中食用酒醋糖酱		
司苑局	掌印、管理、金书等太监	掌蔬菜瓜果		
东厂	掌印、掌班、领班等太监	掌刺缉刑狱之事	与锦衣卫合称厂卫	
西厂	同东厂		不常设	
守 备	南京、天寿山守备太监嘉靖时设承天府守备太监	护卫留都及守陵		
镇 守	各省各镇镇守太监		时人比之督抚	
织 造	提督织造太监	掌织造御用龙衣	设于南京、苏州、杭州	
市泊司	提督太监	掌海外朝贡、交易	设于广东、福建、浙江	

非序之序

所以称之为非序之序，是因为啰嗦。作为一种文体，序应该写得简明扼要。所以要写非序之序，是因为堆积起上千万字，总需要有个说法，或者说，总需要做个说明。换言之，它与其说是篇序，不如说是篇导读。

这可以算作对以下说明的说明。

无计划——计划——计划外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写作《正德皇帝全传》时，没有任何计划。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件没有计划的写作完成了；而且在潜意识里，我觉得还会再写下去。所以，我以“明史纪实小说系列”作为该书的副标题。

《正德皇帝全传》出版后，我开始制定计划，使所谓的“系列”变得明确。

首先，确定这个系列的写作范围。

明朝有十六个皇帝，除开国皇帝朱元璋、末代皇帝朱由检外，我要给其他十四个皇帝（包括武宗）写传。这十四个皇帝是：建文帝、成祖（即太宗，年号永乐）、仁宗（年号洪熙）、宣宗（年号宣德）、英宗（年号正统、天顺）、景泰帝、宪宗（年号成化）、孝宗（年号弘治）、武宗（年号正德）、世宗（年号嘉靖）、穆宗（年号隆庆）、神宗（年号万历）、光宗（年号泰昌）、熹宗（年号天启）。把朱元璋、朱由检排除在外，是因为导师王毓铨先生的一番话。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明史研究，集中在一头一尾，一个朱元璋，一个李自成。他希望我们多研究研究明朝中期。这

不是师训，但对我影响颇深。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我选择了一个很偏的题目：太监刘瑾的变法。正式从事明史研究以后，虽然研究的课题不断向前、向后延伸，但一直不曾涉及明朝的建国和明末的农民战争。

十四个皇帝中，仁宗朱高炽、光宗朱常洛在位日短，其传不足以单独成册，故分别附于宣宗、熹宗传前。

英宗朱祁镇是明朝唯一使用过两个年号的皇帝。在两个年号之间，他是蒙古鞑靼部的俘虏和明王朝的太上皇，坐龙廷的是他的胞弟、景泰帝朱祁钰。在写完正统年间的英宗之后，紧接着写天顺年间的英宗，而把景泰帝单独列为一册，不是不可以，但显然不如依照历史的进程，合为一传，更方便写下来，也更容易读下来。我把这部较为特殊的书命名为《两帝三朝全传》，各册则以“正统实录”“景泰实录”“天顺实录”名之。

也就是说，我计划完成的是十一部作品：

《建文皇帝全传》；

《永乐皇帝全传》；

《宣德皇帝全传》；

《两帝三朝全传》；

《成化皇帝全传》；

《弘治皇帝全传》；

《正德皇帝全传》；

《嘉靖皇帝全传》；

《隆庆皇帝全传》；

《万历皇帝全传》；

《天启皇帝全传》。

其次，确定这个系列的写作顺序。

既然最先写的是正德皇帝，那就不是单纯地从前往后写，或单纯地从后往前写。我的想法是往前写一个，再往后写一个；或往后写一个，再往前写一个。这样安排至少有一个好处：活跃于正德朝的人物，有的在弘治朝已开始崭露头角，有的则到嘉靖朝仍有所作为，容易链接起来。也就是说，接下来应该写《弘治皇帝全传》或《嘉靖皇帝全传》。

二者比较，选择《嘉靖皇帝全传》，似乎是更好的选择。除了正德皇帝的堂弟、以兴王承继大位的朱厚熜，即嘉靖皇帝，和他的生母、太妃蒋氏，即慈仁皇太后，

是首次出现；嘉靖初期的一些关键人物，比如内阁首辅杨廷和，比如吏部尚书王琼，比如被正德皇帝赐封威武副将军、镇国公的江彬，不下一二十人，他们的活动都是直接延续下来的，不必做特别交代。

但似乎是更好的选择，未必真是好的选择。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嘉靖年号使用了四十五年，《嘉靖皇帝全传》的篇幅远远超过《正德皇帝全传》。写《正德皇帝全传》，从准备材料到完成写作，用了一年的时间。而写《嘉靖皇帝全传》，从准备材料到完成写作，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而且，写完《正德皇帝全传》的感觉，是全身心的轻松和兴奋；写完《嘉靖皇帝全传》，更多地感觉到疲惫。

按照这个顺序写下去，估计在一年半到两年之后，就要写在位时间比嘉靖皇帝还要久、篇幅肯定比《嘉靖皇帝全传》还要长的万历皇帝的全传。我开始担忧，甚至恐惧。

于是，我改变了原定的写作顺序，转写篇幅短得多的《建文皇帝全传》。并从这里开始，按照正常的序列写下去；只是把《万历皇帝全传》留到最后才写。

也就是说，十一部书的写作顺序是：

《正德皇帝全传》；

《嘉靖皇帝全传》；

《弘治皇帝全传》；

《建文皇帝全传》；

《永乐皇帝全传》；

《宣德皇帝全传》；

《两帝三朝全传》；

《成化皇帝全传》；

《隆庆皇帝全传》；

《天启皇帝全传》；

《万历皇帝全传》。

再其次，确定这个系列的篇幅。所谓篇幅，首先指字数。这里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总的字数；其二，各部书的字数。其次指册数。篇幅短者，特别如建文皇帝在位仅四年，其传无须分成几册；而篇幅长者，不分成若干册，很难一气写成。

正德计十六年，按照习惯的版面统计，《正德皇帝全传》大约一百一十万字，即平均每年的用字量接近七万。如果以此为准，建文元年是公元1399年，天启七年是公元1627年，其间二百二十多年，用字总量应超过一千五百万。而我预计的总字数

在一千万字左右。也就是说，每年的均用字量在四万五千左右。

当然，一百一十万的总字数，接近七万的年均用字量，只是个参照；一千万的总字数，四万五千的年均用字量，只是个计划。二者都不能作为硬性规定。需要强调的是，一部书的字数和年均用字量，不仅反映某一段时间段的长短和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的故事的多少，也反映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的重视程度。

《建文皇帝全传》的字数约十五万，即年均用字量大约是三万七千。年均用字量在四万五千以下的，还有《宣德皇帝全传》《隆庆皇帝全传》。这是一种情形。

《嘉靖皇帝全传》的字数约二百二十五万，即年均用字量正好是五万。此外，年均用字量在四万五千以上、七万以下的，有《永乐皇帝全传》《两帝三朝全传》《成化皇帝全传》《弘治皇帝全传》《天启皇帝全传》。这又是一种情形。

《万历皇帝全传》的总字数达到三百五十万，即年均用字量约七万三千，超过《正德皇帝全传》。这是第三种情形。

有意思的是，按照这个统计，总字数是一千二百五十万，恰好是参照《正德皇帝全传》得出的总字数和我预计的总字数的中间值；而五万五千的年均用字，也差不多是前两个年均用字量的中间值。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只有一句话尚未证实，即年均用字量反映作者对某一段历史的重视程度。

建文事迹，几乎可以用“靖难之役”四个字概而括之，年均用字量三万七千，篇幅不算短。嘉靖皇帝自登极之后，身边的事，宫里的事，天下的事，连绵不断。和其他各书比较，五万的年均用字量不能算多。尤其是和《万历皇帝全传》比较，两本书的年均用字量是十与七之比，显得很失调。要知道，在我的心目中，这两个时期同样重要；甚至，嘉靖朝的重要性应该高于万历朝。

所以，还需要另外做个比较，即实际字数的比较。使用电脑写作，提供了方便。《嘉靖皇帝全传》总的实际字数约一百九十七万，年均用字量是四万四千字。《万历皇帝全传》总的实际字数约二百五十五万一千字，年均用字量是五万三千字。因为写作方式的不同，后者占用版面较多，而实际的年均用字量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

《万历皇帝全传》写完后，不止一位好友提出，应该加上太祖皇帝和崇祯皇帝的传，不然不完全。我曾一度改变初衷，开始琢磨有没有完成这两部书的可能。

应该说，基础是有的。三十年前，我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中国小通史丛书”撰写《明朝》，十年前，我应朋友之约撰写《天子传·明》，都不可能对明朝的建立和明朝的灭亡这两端不管不顾。特别是《天子传·明》，选了五个皇帝作为重点来写，其中包括朱元璋和朱由检。因此，我手上有一些现成的史料。

但《洪武皇帝全传》即使从建国写起，也不会少于二百万字；《崇祯皇帝全传》则应超过一百万字。要把两部书写得完整、充分，又略感生动、细腻，至少还要花半年的时间读书。我开始考虑，需要读些什么书，在哪些图书馆可以找到这些书。

就在这时，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我不得不投入全部精力去应付。这使得准备工作还没开始就停止，这两部计划外的书的写作不得不搁置起来。这或许有些遗憾；但我想得更多的是，当初制定那样的一个写作计划，或许是天意。

以小说的体裁写历史

我曾经说，历史学者写历史小说，和小说家写历史小说，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以小说的体裁写历史，后者是以历史的题材写小说。这当然不是绝对的，但我完成“明史纪实小说系列”，并通篇阅读之后，我仍然想说，我是在以小说的体裁写历史。

一般会认为，以小说的体裁写历史，最重视的是历史的真实性，是还原历史真相。这其实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不妨举个具体的例子。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宫中大火，建文帝被烧死；第二个说法，宫中大火，建文帝从地道逃出，浪迹天涯。

《明史》惠闵帝本纪的记述是：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

谈迁《国榷》卷十二的记述是：上急时欲自杀，翰林编修、朝邑程济曰：臣逆知有今日。为今计，莫若出亡。……（众臣欲从），上手麾去之，同程济及中书舍人、定海梁良用潜出西华门。沿河得空舫，良用鼓柁抵南门，舍舟易塗。

查继佐《罪唯录》帝纪卷之二的记述是：或云帝薙发出亡。燕王清宫三日，官人指所焚尸以应。遽出尸煨烬中。王俯而哭之曰：稚无知，至此乎！

《国榷》和《罪唯录》是私家修史，或出于对建文帝的同情，或因为偏信某家之言，明显地倾向于建文出亡一说。《明史》是官修史书，要严谨得多。虽然两个说法都写到，似乎并重；但一个“诡称”已表明编纂者的态度。在该卷的赞中更指出：草野传疑，不无讹谬。

如果说，这些都是明、清之际和清朝早期的著作，距事发时较为遥远，那么，我们还可以追溯到明朝中期，看看那时的史家是怎么看这一事件的，或者说，是怎么写这一事件的。

韩邦奇是正德、嘉靖年间的官僚学者，《正德皇帝全传》《嘉靖皇帝全传》都写到他。他的《宪章录》是明朝中期罕见的本朝编年史。关于建文帝的结局，《宪章录》中有两段记载。

第一段见于第十四章，革除建文三年辛巳至四年壬午，只有简单两句话：须臾，宫中火起。上便服削发，自御沟出，至郊坛遁去。

第二段见于第二十四章，宣德七年壬子至正统五年庚申，是一大段记述：（正统五年）十二月，广西思恩知州获异僧，升为思恩府，擢思恩州土官岑瑛为知府。瑛遇一老僧于道，从者呵之不避，诘其度牒检之，乃杨应能也。遂自言曰：此非吾姓名，吾乃托此而逃者也。汝独不闻乎？自金川失守，大内火起，吾遂潜由地道以出，自湖湘入蜀，至云南，复至闽，最后入广西，至横州南门寿佛寺居焉。居十五年，僧徒归者日众，吾复遁往南宁陈步江一寺，而归者复如之。乃又去南宁，云游四方，以度岁月。迤邐至此，沦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待尽，早晚入土，无能为矣。行道伤嗟，君侯独无怜悯之心乎！愿送骸骨归。瑛大惊，闻于巡按御史奏之，驿送赴京，号为老佛。

记述中，以小字附老僧于途中所吟七律一首。

韩邦奇的记述，比起《国榷》《罪唯录》等后世史书的记述，要详尽得多。明、清之际的史家所以采用其说，而不详录其记述，或许是因为王世贞对他的批驳。

王世贞是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官僚学者，和明朝的一代名相张居正是同年进士，不仅是明朝后期文坛领袖人物之一，也堪称明朝的史学大家。《弇州山人四部稿》及续稿，集中反映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弇山堂别集》和《弇州史料》，则集中反映了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我在嘉、隆、万三部书中，讲述了他和严嵩父子的关系，和张居正的关系，和同时代的文士的关系。

《别集》卷二十一《史乘考误二》中，王世贞从几个方面批驳了《宪章录》对建文帝火中脱逃、削发为僧的记述。

关于姓名。《宪章录》只写老僧冒名杨应能；实际上，经讯问，已知他的真实姓名是杨行祥。

关于乡贯。如果老僧即建文帝，他的乡贯应是凤阳，或者南京；实际上，经讯问，已知他是河南钧州白沙里人。

关于年龄。建文帝生于太祖洪武十年，至正统六年（鞠讯老僧的年份），应该是六十四岁；实际上，老僧死时已九十余岁。

关于思恩。《宪章录》称，思恩知州获异僧，升府；实际上，思恩州升府在正统

四年，正统六年，升军民府。

关于吟诗。《宪章录》所录老僧吟诗，未注明出处，其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两句，迹似反诗；王世贞批驳道：大抵建文出亡与否不可知，僧既腊已深，当灭迹已终，必不作此等诗以取祸，亦必不肯出而就此危地。

所谓“既腊已深”的“腊”，应取《左传》“虞不腊矣”之意。即建文既躲过一大劫，从常理分析，绝不会以身涉险，自投罗网。

我不厌其烦地摘引明朝中期史家、明清之际史家、清朝前期史家对这一事件的记述，无非想说明，还原历史的真相，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譬如建文帝的生死之谜，肯定是个好的素材。以历史的题材写小说，不妨认定建文帝的出亡，从中虚构出许多有趣的情节；但以小说的体裁写历史，不但认定建文帝出亡是草率的，认定建文帝死于宫中大火，也未必是真实的。要知道，王世贞尽管自信正统年间的怪异老僧绝非建文帝，但也不得不承认：大抵建文出亡与否不可知。另外，他并不否认，正统年间，确曾有一怪异的云南老僧被解入京师。

我曾感慨于医生的格言：有时治愈，经常安慰，总是关怀。我想，治史者可能也应该有自己的格言。如果问我的话，让我感慨的也有三句话：有时真实，经常模糊，总是存疑。

如果说，许多事件对史家来说都是个谜，那么，抱定还原历史真相的宗旨写历史小说，显然是不现实的。我宁愿用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来表明我的态度：言必有据。换句话说，我不能保证还原了历史真相，但我努力做到，稍微重要的人物，稍微重要的情节，以及重要的典章制度，都有出处，哪怕是出自明朝人的笔记和野史。

回到上面的例子。写建文帝，不但对他生死一事，要有个交代；对它在后世衍生的故事，也要有个交代。

《建文皇帝全传》的结尾，我连建文帝究竟死没死都不曾提及：朱棣陪吕太后出营观看，皇宫火势甚猛，火苗有数丈高，映红半边天。朱棣眼圈红了，泪水呼之欲出，道：“痴儿，谁是来索你命的！”

朱棣呼建文帝“痴儿”，在许多史书中有记载。只不过，有的写作“小子”，有的写作“稚”，意思相同。我以为，“痴儿”的叫法感情色彩更浓一些。

《永乐皇帝全传》的开篇，有一段永乐皇帝和建文朝的大儒方孝孺的对话：

“我起兵靖难，以清君侧，不过欲效周公辅成王的故事。方学士说，这有什么错吗？”皇帝道。

“成王安在？”方孝孺马上问。

“彼自焚而死，我亦心痛。”皇帝道。

这几句对话完全引的《明史》方孝孺本传。永乐皇帝的主要谋臣姚广孝为他守北平，曾请求他攻下南京后不要杀方孝孺；他不顾姚广孝的请求而杀方孝孺，这次的对话，特别是“成王安在”这句尖刻的质问，应该是重要原因。

《两帝三朝全传》有两处，对云南老僧做了较为详尽的交代。

第一处，在广西横州佛寿寺，来自滇南的老僧对方丈说了如下一段话：“此寺乃西南一间古刹。你若要问它建于何时，我亦不知；你若要问它得名于何时，我可以告诉你，它几与大明朝同龄。佛寿二字，乃一智者所命，但与我有些渊源。智者名谁？无须告你。我想告诉你的是，他是东南人，而非西南人；我还想告诉你的是，他若活到今天，正好一百三十岁。所惜者，天不佑智者；所幸者，智者亦不求寿。我今日赶来这里，为的悼念一番这位故人。”

老僧提到的智者，刘伯温也。稗史编造出一个故事：刘基知燕王朱棣必篡大统，预置袈裟、度牒等于宫中，并挖通出宫的地道，这才使得建文帝有机会出亡。小说家甚至说，刘基做的这些安排得到朱元璋的首肯。

这个故事可信度极低，断然否定，亦不为过。从时间上来说，刘基死于洪武八年。做一系列保护幼主的安排，他先要预测出，建文帝将出生在洪武十年，太祖皇帝长子、建文帝之父、懿文太子朱标将死于洪武二十五年，建文帝即位后将采取削藩之策，燕王将起兵靖难。除非人类真有迄今为止尚未证实其有的能力，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而老僧把刘基称作“故人”，尤觉可笑。

既然可笑，还堂而皇之地写下来，目的在于：第一，希望稍稍增强人物的生动性、情节的生动性；第二，可信度极低的故事，由一个身份可疑的人说出来，比由一个身份真实的人说出来好。这个故事可以是任何人杜撰的，为何不可以是云南老僧杜撰的？

第二处，在北京，借小宦者之口，说出云南老僧的真实面貌，即复述王世贞对韩邦奇的批驳：“初时风闻云南老僧被迎入大内。咳，其实哪里是大内！西安门内对着西苑，有一处院落，云南老僧被迎到那里了。该院落是当年宣德爷拘禁汉王之处，说它是锦衣卫的密狱亦可，说它是东厂的密狱亦可。总之，绝非迎入大内奉养。”“初时都以为云南老僧没有出处；现在查出他的出处了，他是河南钧州白沙里人。”“初时以为云南老僧无姓名；现有黄册可证，他姓杨名应祥。初时以为无法得